

社会学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

阎 鸣

历史：曲折的历程

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十年，是中国社会学近百年历史链条中的一环。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依其自身发展的脉络，可以分作五个时期：传入、建立、发展、中断和重建。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和论述中国重建十年的社会学。之前，对其前四个时期的历程做一简略的回顾。

一、传入时期（1895—1913）

社会学是在19世纪末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其时，中国社会面临危机：民族濒亡、经济凋敝、主昏政暗、内外交困。爱国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富民强国，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社会学应运而传入。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英人锡彭塞（斯宾塞，H. Spencer）及其社会学，并称之为“群学”^①。1903年，严复节译出版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一书，译名为《群学肄言》。作为“中国西学第一学者”的严复，还翻译了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斯密（A. Smith）的《原富》等，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启迪人们寻求解救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

但是，“社会学”一词，最早见于谭嗣同的《仁学》。^②它是由日文转译而来。在这一时期，有不少从日文翻译的社会学书籍，又多是日本译自西方的社会学论著。它们经过留日归国学人之笔，译介到中国。显然，这同当时留日学生人数之多不无关系。

二、建立时期（1913—1930）

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1913年教会办上海浸礼学院（后称沪江大学）设立社会学系，标志着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开始建立。中国自办大学设立社会学系，则厦门大学于1921年开其端。到1930年，中国已有16所大学，或设置社会学系，或设立社会学专业。无论是教会大学，还是自办大学，其社会学系多由美籍教师任教。然而，早在1916年留学归国的康宝忠在北京大学开社会学课，是为本国教授在自办大学讲社会学之始。后来陆续有一些中国社会学教授陶孟和、孙本文、李景汉、许仕廉、陈达等任课，他们都为这门学科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① 严复：《原强》，载天津《直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895年3月4日）。

^②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仁学》（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54年版，第6页。

表1 中国社会学发展分期

	分 期	时 间
1	传入时期	1895—1913
2	建立时期	1913—1930
3	发展时期	1930—1949
4	中断时期	1949—1979
5	重建时期	1979—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立，催促着社会学译著的问世。此期，不但翻译了西方社会学名著，如迪尔凯姆（E. Durkheim）的《社会学方法论》（1925）和爱尔华（C. A. Ellwood）的《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1920）；而且出版了中国社会问题丛书与专著，如陶孟和等的《中国农村与都市生活》（1915）和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1918）。同时，社会学的调查，多为在华美国人所做，或由美国人指导中国学生所做，而调查报告用英文发表，《北京——一个社会调查》（Gambles & Burgess, 1921）和《中国华南生活》（Kulp II, 1925）就是例证。

三、发展时期（1930—1949）

1930年，全国性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成立，由当时多产而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1892—1979）任会长。中国社会学社主办的刊物《社会学刊》，亦由孙主编。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使社会学的研究，从分散到联合，从一隅到全域，从外主中客到外客中主，这是中国社会学自传入、建立而走向发展与成熟的显著标志。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繁，教学人数增加，学派异说纷呈，表明它在向前发展。中国社会学社自成立到1949年，先后共举行9次学术年会。它的会员在学社成立初期有66名，1943年增加到132名，1947年9月则发展至160名。到1948年，中国49所大学中已有21所设置社会学系，社会学的教师人数为140名，本科生人数约为600名。在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由于师承不同，中国社会学家将欧美社会学各个学派传入中国后，便形成不同的学派。有美国的文化学派、功能学派、人文区位学派，法国的社会调查学派、迪尔凯姆学派，以及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等。

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尺度，是中国社会学家提出“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①这就是运用外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所写东西援引中国资料，出版论著使用中国文字。如陈达的《人口问题》（1934）、柯象峰的《中国贫穷问题》（1935）、李景汉的《中国农村问题》（1937）、孙本文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1942）等。还有一批颇具影响的调查报告：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30）、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1941）和费孝通的《禄村农田》（1943），其中有些著作的英文版本亦存在。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转向了新的旅程。

在中国社会学1949年以前的发展史上，除已述“经院派”社会学外，尚有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问题者。早在1923年，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设立了社会学系，共产党人瞿秋白任系主任。尔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社会学论著，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5）；调查研究社会问题，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其他则不乏举例。他们的主旨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并为社会革命提供依据。

纵观中国社会学传入、建立和发展的三阶段史，可归纳出移植性、经验性和个体性三个表征。其一，中国社会学前期基本是移植、钞说欧美的社会学，后期则有“中国化”的研究趋向。这同其社会学的教研人员构成密切相关。据1947年统计，全国社会学教师（包括正副教授和讲师）共143人，其中外籍教师12人（全部为美国人），留过学的107人（内留美71人），留学和外籍的教师占总数的83%。^②其二，中国社会学者在探索中国社会问题时，强

^① 孙本文：《中国社会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中国人口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版，第19页。

^② 据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附录”《中国各大学社会学教授姓氏录》统计。

调经验与实证，注重调查与研究，并积累中国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其三，中国社会学者多以个人为单位，或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和课题研究，所得成果亦由个人署名发表，很少有配合社会行动和政治实施的合作性研究。

四、中断时期（1949—1979）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不久，中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停止招生，标志着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中断的开始。1952年，经过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撤销社会学系，造成社会学发展的中断。^①其原因有三：按照苏联模式调整院系，苏联不设社会学系，中国也不设；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真科学，社会学则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高等院校不容有其位置；中国社会主义白璧无瑕，不存在社会问题，不需要社会学研究。

在1952至1979年的28年间，尽管中国社会学家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如孙本文发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对旧中国的影响》^②等文章，且社会调查继续进行，如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但社会学受到否定，社会学家遭到批判，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是完全中断了。只是在1957年短暂几个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较为宽松气氛中，陈达等社会学家要求恢复社会学，并开始了筹备工作，^③可不久统统被打成右派分子。^④从此，社会学呼吁杳无声息，社会学教研成为禁区。

然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社会学在中国以别种形式存在，并称之为“大众社会学”。^⑤其主要论据是毛泽东著作中有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并有大量社会调查现象存在，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成了实践社会学家”。^⑥笔者认为，他们的臆断不能成立。这是因为，毛泽东著作不等于中国社会现实；不可把一般社会调查同社会学调查相混淆，也不可把一般社会问题研究同社会学的社会问题研究相混淆。其时的那种所谓“社会调查”，如“四史”^⑦，为服务于其时“左”的群众运动，同科学的社会学调查与研究南其辕而北其辙。

重建：十年的发展

1979年3月，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的座谈会上，^⑧胡乔木为社会学“正名”，中国社会学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学会）成立，以《江村经济》一书著称的费孝通任会长，是中国社会学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中断期的终结与重建期的开始。

① 陈定谔：《中国社会学史》（打印稿），第61页，1986年。

② 孙本文：《新建设》，北京，1956年第11期。

③ 《关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几点意见》（打印稿），1957年4月8日。

④ 袁方：《要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搞资产阶级社会学》（打印稿），1979年3月15日，第5页。

⑤ L. C. Young, "Mass Sociology: The Chinese Style",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974, Vol. 9, (August): 117-125.

⑥ L. Cheng and A. So, "The Reestablishment of Sociology in The PRC: Toward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a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3, 9: P479.

⑦ 1963至1965年间，开展的群众运动，编写和学习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或矿史）称为“四史”。

⑧ 此会之前，开过四次座谈会，参见《关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意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通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编，北京，1979年2月27日。

中国社会学重建十年发展面貌，可分为队伍建设、研究领域和学术成果三个方面，博观约取，综阐缕述。

一、队伍建设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迈出的第一步，是组织教学与研究的队伍。鉴于它已中断28年，原社会学毕业生所余不多，均已改行，且其中最小者已逾“知天命”之年。胡乔木对此感伤地说：希望从我们开这次会到有些大学设立起社会学系，这中间不要开追悼会。队伍建设，迫在眉睫。通过办短训班、专业班和研究生班，老一辈社会学家和外国社会学教授担任讲席，培训高校师资和科研人员。现正形成规模可观的社会学队伍，主要有高校系科和科研机构两支。

高校系科设置（教委系统）——目前已有12所高校设立社会学本科教育，其中9所大学设有硕士学位、1所大学（北京大学）设有博士学位，且2所大学设有研究生班（非硕士学位）。另外，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招收社会学专业的业余学生，它始于1985年，共有约26000名学员。社会学的教育见表2。

表2 1988年中国社会学教育表

	本科生	研究生班	硕士	博士	总计
已毕业	173	49	26	2	250
在读	1175	50	158	10	1392
小计	1348	99	184	12	1643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1989。

社会学调查与研究机构。

与社会学队伍建设同步，其学术团体相继建立。它有三级：一级为中国社会学学会，其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它只接纳团体会员。二级为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社会学会，现有21个，其下设婚姻家庭、城市、农村、民族、文艺、青年、老龄等若干分支学会。三级为地区、市、县的社会学研究会。上述三级学会、研究会会员约有5000人。

二、研究领域

中国社会学重建十年的研究领域，以历史演进为经，以重大课题为纬，可做如下概括：1979至1982年重建初期，研究集中于两个重点——一是如何确立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其中焦点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二是对中国社会构成巨大压力的人口问题。1983年社会学规划会议后，“小城镇研究”、“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城市人口问题研究”等被

科研机构设置（社科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于1980年1月成立，下设社会学理论、科学与发展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生活方式与婚姻家庭、青少年问题共6个研究室。目前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29所社会科学院中，已有27个建立社会学研究所（19个）或研究室（8个）。此外，还有机关、事业、企业所属和民办的

表3 中国社会学家数量与分布

	教授	副教授	其他	总计
高校	10	—	—	10
中国社科院	4	22	74	100
地区社科院	2	43	273	318
小计	16	65	347	428

资料来源：《地方社会科学院简介》（北京，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所简介》（北京，打印稿，1989）；《中国社会学手册》（沈阳，1988）；《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教授名录》（北京，1988）。

列为“六五”期间(1981—1985)国家项目,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以这三个问题为重点而展开。1986年“七五”(1986—1990)社会学规划会议,将社会发展、社会结构、阶级和阶层、生活方式、老龄问题、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等13项列为重点课题。此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已全面铺开,至今已涉及几十个分支学科。下面将评述研究比较集中的三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关系的研究,像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是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它一直困扰着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家。论辩范围包涵广义与狭义两个层次。所谓广义,是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社会学为具体科学,二者之间为一般与个别、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都是科学,可以互相渗透、兼容和补充,二者之间是平行关系,即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学派的地位。此外,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学,将二者完全汇叠在一起。所谓狭义,是指社会学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特别是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一种意见主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学派,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在中国应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是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界的热点研究领域。这个课题可归纳为纵向研究、横向研究和开放研究而加以阐述。纵向研究:探讨三千年来中国婚姻家庭的结构和变迁,并探研中国的历史传统、儒家文化和宗法思想对现代婚姻家庭之影响。横向研究:涉及范围宽、题目广,如择偶方式、婚姻道德、早婚离异、家庭职能、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家庭规模、两性角色等问题。开放研究:对多年来被尘封的禁区,如未婚先孕、第三者插足、姘居和性等进行了或深或浅的研究。婚姻家庭问题在社会学诸分支学科研究中的位置,可见表4。

社区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界持续的兴趣所在。注重社区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传统: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在农村社区的研究;1979年以来,农村社区研究显得薄弱,小城镇问题则成为社区研究的强点。小城镇研究是为着探索解决中国城乡结构、人口爆炸出路和乡村城市化道路而提出来的。它的研究试图找到既成为农村过剩劳动力“蓄水池”,又不给已经人口饱和的大城市造成压力的新途径。费孝通主张大力发展小城镇,并为此而亲自主持课题、组织力量以及付诸实施。他的观点一直占着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其个人威望而得到政府支持。与此相反,另一种起初微弱而日益强烈的呼声是,“根据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我国城市化的现阶段,必须选择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①折衷的观点则不主张各执一端,而应以发展中等城市为重点。此外,还有人持论:多种模式,各伸所长。

上举三端,仅列大要。研究领域诸多,不能逐一详述。将在下节文中,分别略作反映。

三、学术成果

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作为学术研究中调查报告与专题论文载体的社会学刊物,1988年已公开定期出版的有6种,内部不定期出版的有10余种。上海大

表4 婚姻家庭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位置

分 类	研究人员	文 章	书 籍
占总数的百分比	13.7%	13.1%	12.2%

资料来源:周贵华《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选题倾向分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4页,以及本人所做的统计。

^① 李迎生:《关于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模式的探讨》,《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第36页。

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主办的《社会》，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第一家社会学刊物，但出于各种原因，它近乎于通俗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的《社会学研究》，是中国最高的社会学学术刊物。其他如《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社会学探索》、《社会学与现代化》等社会学刊物，均较偏重于实际的社会调查研究。至于《国外社会学》（内部），则着重译介和评论西方、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学的学术成果和最新动态。

1979至1987年，共发表社会学文章2562篇，其分类统计，详见表5。

表5 社会学文章分类变化统计表（1979—1987）

	文章总数 (篇)	文 章 数 量 (篇)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 总论	281	20	15	31	41	37	29	23	41	34
2. 理论、历史	134	1	7	7	15	17	19	31	24	13
3. 社会统计、社会调查、方法论	159	2	1	10	11	23	28	22	27	35
4. 社会结构、分层	56	4	3	2	3	9	6	11	10	8
5. 社会管理、政策、指标体系	98	3		2	7	10	19	21	13	23

表5显示：第一，研究的热点，有几类文章占文章总数的百分比较高，即婚姻家庭类占13.7%，居首位，社会学总论类占10.97%，居次位。第二，研究的趋向，有几类文章在历年中起伏较大，即社会学总论类从1979年的20.4%下降到1987年的7.9%，社会心理学类从

**表6 社会学自著书籍分类统计表
(1979.1—1987.12)**

	总 数	百分比 (%)
总 计	234	100
理论 历史	13	5.6
概论 通俗性	23	9.8
国 外	12	5.1
方 法	14	6.0
社会心理学	11	4.7
婚姻家庭	31	13.2
社会发展	2	0.9
青少年问题(犯罪)	11	4.7
生活方式	8	3.4
老龄社会保障	6	2.3
文 化	6	2.3
人 口	76	32.5
社 区	6	2.3
其 他	15	6.4

1979年的1.5%上升到1987年的14.3%。

社会学的书籍，截止1987年12月，出版的社会学书籍共345本（包括部分人口学和文化学书籍），其中翻译书111本（占出书总数的32%）。①重建社会学十年来著译新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自著书籍的分类，详见表6。

从表6中可以看出，在书籍出版总数中，最多的是人口问题研究，共76本，占32%；其次为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共31本，占13.2%；第三为通俗性社会学科介绍或社会学概论，共23本，占9.8%。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十年的队伍建设、研究领域和学术成果，突出的表象是专业队伍庞大、分支领域宽泛、发表论著量多。但就学术质量而言，资料翔实、功力深厚、研究系统、观点独到的论文和专著甚少。究其原因，一则是社会学恢复后研究时间短暂。二则是与社会学专业队伍人员构成和素质有关。在中国社会学专业队伍组建过程中，产生一种历史因素铸成的特殊现

① 作者据《全国新书目》（1979.1—1989.5）统计。

象，这就是有一批转行过来的社会学者。他们大多数只受过短期社会学训练或通过自学，却是目前中国社会学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当今各学科间相互渗透的大趋势下，他们吸收其他学科之优长，有益于社会学的发展。它的正面影响，已为人们所重视。^①但它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有的原来从事理论工作，便以思辨的思维研究社会学，总在概念里面兜圈子；有的原来从事实际工作，便以直觉的经验研究社会问题，常为经验现象所縻囿。凡此种种，都不顾社会学自身规律，是社会学“庸俗化”、“非学科化”的表现。其症结在于中国社会学重建初期组建队伍时缺乏远见、急功近利，实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上的一个战略性的失误。

性格：比较与评价

考察中国重建十年的社会学，不但要静态描述其整体面貌，还应该将其置于中国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对它的性格特征做历史的和结构的剖析。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主转变，并从僵化、封闭的硬壳中挣脱出来，在向改革、开放的轨道上行进。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发展，正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变迁中发生、变化的。归结起来，中国重建十年的社会学具有四个性格特征：主体性格、实用性格、群体性格和开放性格。

一、主体性格

中国重建十年社会学的第一个特征是主体性格。它是指中国社会学以研究中国现实社会为主体，具有中华文化色彩，借鉴西方社会学之优长而为研究中国社会所用。这一性格是与传统中国社会学、与台湾社会学及其他国家社会学相比较而言的。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学，前期“钞说”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后期则产生“中国化”趋势。1949年后台湾社会加强了同美国的联系，其社会学受到美国社会学核心范型的影响，更加“钞说”美国社会学，从而形成“依赖性格”^②或“移植性格”^③。诚然，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学，受欧美社会学的影响，也具有“移植”的特点。^④但是，相比之下，重建后十年的中国社会学则表现出主体性格。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继承了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本土化”趣向，强调社会学的“中国特色”。学术文化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环节。大而就整个学术体系来看，小而就社会学自身来说，均为社会与文化特征所派生。重建十年社会学的主体性格，追溯其根源，乃是中国四十年独立自主社会性质的学术体现。对此，费孝通说：“我们的立足点，一定要站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五十几个民族、十亿人口的中国国土上。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包括吸收、学习外国对我们适用的先进方法，好好地认识我们的国家、民族、社会。”^⑤

① Alice S. Rossi, edited,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5, P4.

② 萧新煌：《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问题：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初探》，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的中国化》，中国台北，1982年，第82页。

《三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学：历史与结构的探讨》，赖泽涵主编《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中国台北，1982年，第329页。

③ 叶启政：《从中国社会学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方向与问题》，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的中国化》，中国台北，1982年，第133页。

④ 关于国家发展社会学趋势，见“Universality of Science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Sociologies”，Harry H. Hiller,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4 (August 1979) : 124-135.

⑤ 费孝通：《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费孝通社会学文集》，《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的人才及其训练,基本上来自本国。目前从事教学与科研的社会学者全部为中国人,主要由自己培训。老年社会学家,于1949年以前受过社会学训练,其中有些人曾留学西方;中青年社会学者,为社会学重建后通过短训班、本科班或研究生班接受社会学训练。虽有一些外国社会学教授来华讲学,但均为时暂短而席居客位。可以说,无论老年社会学家或中青年社会学者,他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着眼点,都根植于中国本土。另外,八十年代去外国接受社会学训练的人,多未学成回国,更未形成主体。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在研究的立足点、对象、主题和方法上,均表现出主体性。中国社会学学者将中国的社会与人作为自己的学术视野,据统计,以国外社会学为研究领域的仅占5.9%。在近年出版的社会学自著书籍中,关于国外社会学的著述占5.1%。已发表论文中探研国外社会学的也为数甚少。中国社会学早年植入的社区研究法和近年引进的问卷调查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搜集资料以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学重建后,对待外国社会学以取精弃糟、中体西用为原则。十年来,中外社会学以多种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学术交流。翻译文章占文章总数的34%,译著书籍占出版书籍总数的31%,但译介者众,精研者寡。在引进国外社会学时,方法运用较之理论吸收更为热心,其目的仍在于为研究中国社会提供借鉴。

二、实用性格

中国重建十年社会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实用性格。它是指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不是纯粹为着学术目的,而是注重调查社会现状,解决实际问题,服务现行政策。下面分问题取向、政策取向和经验取向,对上述实用性格加以阐述。

问题取向。1952年完全中断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理由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消除了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私有制,因而社会和谐,没有矛盾。后来事实表明,中国客观存在着大量人民内部的社会问题,如人口、住房、婚姻家庭和青少年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学家对其做出学术“诊断”,开出科学“药方”;而中国社会学家也以此来证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价值和实际用途。所以,“诊断”与“治疗”中国社会问题之“病症”,是中国社会学家调查和研究的起点与归宿。近十年来发表有关社会问题的论文,占社会学论文总数的44%,为各类论文数量之冠,就是佐证。

政策取向。中国重建以来的社会学,同政府制定政策、组织实施和信息反馈密切相关。政府和事业机关愈来愈求助于社会学家从事政策取向的调查和研究;社会学家也希望据此取得政府人力、物力、财力和道义上的支持。特别是政府欲改变过去那种靠个人拍板、凭经验决策的方法,而依据科学决策,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没有科学的社会学理论作指导,我们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会带有盲目性。”^①这个论断点明中国社会学与政府决策的关系,而下述社会调查则提供了说明这种关系的实例。实例之一是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首期20000名学员中,各级管理干部占75%,他们将社会学知识运用于行政管理和政策制定。实例之二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沿海开放城市秦皇岛,提出秦皇岛应作为北京门户而发展的报告,引起中央重视。实例之三是天津市政府与社会学者联合,每年进行“天津市千户居民问卷调查”,调研居民对市府工作的评估和建议。调查报告由市府发文下属各部门领导,供其了解民情、参考决策。最后一个实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进行一系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

^① 朱厚泽:《社会变革与社会学》,载《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3期,第2页。

心理的调查,包括物价、劳动、工资等专项,为改革决策提供社会心理背景材料和依据,以及时调整政策。上述表明,政策取向是中国社会学实用性格的鲜明特色。

经验取向。近十年间,中国社会学者展开了大至全域、小至社区的多类型、多层次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厚于资料搜集而薄于理论概括。就其总体来说,属于经验层次。此种经验取向,是上述问题取向和政策取向的逻辑必然。这是因为着眼于问题和政策的非学术性研究,仅期藉资料了解事实和描述现象,不必要建立学术假设和理论架构。经验取向的深层蕴涵,同主体性格相关。要认识中国社会,需进行经验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为建立以研究中国社会为主题的社会学奠下基石。

上述表现为问题取向、政策取向、经验取向的中国重建后社会学实用性格,是社会学与外界,特别是政治力量互动和妥协的一个结果。社会学的研究若是在政府的资助下,“则它必然向应用社会科学和社会工作活动方向发展”^①。其实,社会学的实用性格不为中国所独具,它来自美国社会学的经验实证传统,且在其影响下成为当今台湾、解放前的中国和许多国家社会学的普遍现象。然而,实用性格中之政策取向则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显得异常突出。^②

三、群体性格

中国重建十年社会学的第三个特征是群体性格。它是指中国社会学家、政府官员和业余社会学者,为配合社会行动和政策实施,协调各类机构,动员各方力量,进行合作性社会调查和专题研究,其成果为群体协作的结晶,或由集体署名发表。这里所说的群体性格,是与1949年前中国社会学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社会学的“个体性”特点,作纵向与横向比较而言。由此,重建十年中国社会学的群体性格,以其群体结构和群体规模而显具特色。

群体结构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群体性格的一个重要表征。它在组织构成、人员组合与机制运行上,都得到充分的反映。首先,重大研究课题的组织构成,是由若干单位、若干个人结成课题组。课题组按统一提纲和调查方法,协作调查,共同分析,集体写出调查报告或研究论著。其次,重大研究课题的人员组合,就其纵向而言,参加者有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和乡级的有关人员;就其横向而言,参加者有科研、教育、行政和学会等方面的有关人员。除有专业社会学者参与外,还有各级行政官员和社会学会(研究会)会员参与,发挥其层次多、分布广、人员众之优长。重大课题研究的机制运行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行业配合、区域协作以进行调查和研究。许多以研究社会发展和重大社会问题的课题之组织与研究,都显示了上述特点。国家和地方“六五”、“七五”社会学诸项目等就是明证。以上表明,社会学重大课题研究的组织构成、人员组合与机制运行,从初起准备到完成实施,从问题论证到作出成果,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群体性原则。

群体规模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群体性格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它在重大课题研究的范围、人员众与时间长方面均得到充分的显现。重要课题研究,覆盖范围宽广。中国体改所在全国广阔区域选择四十个城市,以各市体改委(办)为依托,设置调查员,建立城市网络。重要课题研究,参与人员众多。全国五城市——京、津、沪、宁、蓉所属许多单位的社会学者,多人参加,通力合作,完成“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的课题。重要课题研究,持续时间较长。关于北京城市发展与人口问题,长时期而分阶段的研究,即为实例。但是,反映上述

① George A. Kourvetaris, "A Report on Sociology in Greece",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3 (August 1968): 244.

② Soviet Sociology Shares a Similar Experience, Which is Labeled as "Practical Empiricism" by Robert Merton, Cited in Alex Simirenko, ed., *Soviet Sociology: Historical Antecedents* (Chicago, 1966), P. 22.

重大课题研究范围广、人员众和时间长的群体规模特点，小城镇研究是典型的个案。这个课题，自1983年开始到目前还在进行中，从江苏扩大到全国，已展开全面研究。其中一次普查，即在中央和江苏省政府支持下，由社会学家、政府官员和业余社会学者组成调查组。它对江苏省辖6县1区所有小城镇的经济、社会状况作普查。参与调查者包括自中央至乡镇各级人员达1000多人。这种对某一社区进行如此范围广阔、旷日持久、人员众多和系统深入的调查实属罕见。

中国社会学以重大社会问题为研究重点，是其群体性格产生的直接原因。1981年，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后者对“社会发展”的强调，意味着中国社会学除依自己专长和兴趣从事研究外，从此承担了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研究的责任。而这种规模大、时间长的课题研究，靠个人分散去做难以奏效，需各方协作才能成事。然而，探究“群体性格”的深层成因，它是中国公有制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反映。同中国1949年前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个体性格”根源于私有制一样，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群体性格的根源则在于公有制。同时，集中政治和一元性文化是“群体性格”形成之辅因。因为集中制政治可以动员行政力量参与，一元性文化则能使相关者参加。上述社会与经济、政治与文化诸种因素，形成重建后中国社会学之群体性格。此种“群体性格”在重大课题研究和基本材料搜集中已显示出优势，但它掩盖个人独立探索和深入理论探研之局限性也不可忽视。

四、开放性格

中国重建十年社会学的第四个特征是开放性格。它是指中国社会学在与外国社会学进行学术交流时，兼容而不排它的特点。社会学起源于欧洲，尔后传入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国际性学科，它在国家之间学术交流本属极自然的事，中国1949年前社会学如此，其他国家社会学亦如此。然而，中国社会学的中断时期，恰为中国社会处于封闭状态阶段。它的重建与发展，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开放性格也是在这种大环境中产生的。

中国社会学的开放性格，表现在设立留学制度、互派访问学者、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国内举办学术会议、合作研究和翻译文章论著等。以所译的社会学书籍为例，1979至1987年，在出版的345本书中，译著为111本，占总数的31%。按所译书籍国别（地区）分，美国41%（45本），苏联26%（29本），西欧15%（17本），日本10%（11本），东欧5%（6本），其他3%（3本）。西方社会学（美、西欧、日本）的译著占66%，表现了对这种引进的热心。对苏联、东欧的译著占31%；这除译者兴趣因素外，尚有一历史原因，就是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东欧国家派出大量留学生，他们中不少人懂其语言而作翻译。

综上所述，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实用、群体和开放性格，反映着中国社会学的基本特征；至于其他一般特征，限于篇幅，不作论述。

总结：回顾与瞻望

一般地说，一门学科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内外两个因素的作用。内部因素是指学科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外部因素是指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内外因素同时存在、交互作用，有时某一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据此，可以对内外因素作用下，社会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史，做如下回顾与总结。

一、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经过了传入、建立、发展、中断和重建五个时期，是坎坷而

曲折的。然而，这并非独一无二。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①，如联邦德国、苏联^②、东欧国家^③、台湾等社会学的发展，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就影响社会学发展的内外因素来看，社会学传入中国后，建立和发展时期，社会学主要依其自身规律演进；中断和重建时期，导因于社会文化环境，尤以社会政治因素为甚。

二、社会学在中国经历十年的发展，已经铸成了若干性格特征——主体、实用、群体和开放性格。一方面，它们是中国早期（1949年以前）社会学特征——移植、经验和个体性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环境对它们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而其中有的特征，如群体性格，则完全是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是政治因素所致。

三、中国社会学重建十年的成就在于，恢复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位置，并建立了一个初级的却又具有“中国味”的社会学学科体系。

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将仍然取决于内外因素的作用与变化。其外部因素，主要是中国社会文化大环境、特别是政治气候的变化。当社会文化环境气氛宽松时，社会学家可能会探一探研究领域中的“禁区”；相反，当这种气氛紧张时，探索就会缩回去（个别学者可能例外）。其内部因素，就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身的发展条件而言，它取决于社会学队伍的构成和社会学者的素质。中国青年一代社会学者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社会学训练，几年之后，他们与目前正在西方接受社会学训练、为数不少的中国学生形成新的力量，可能会更加系统而全面地引进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然而，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格是五十年前提倡“本土化”定下基调，重建十年得到加强，今后恐亦难变其主调。

国际社会学界所企待的，不仅是中国兴旺的国家社会学，更是一个蕴涵中华文化特质而能够对世界社会学有所贡献的中国社会学。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唐军

① Raj P. Mohan and Don Martindal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World Sociology»(Greenwood Press,1975)。

② Vladimir Shlapentokh,«The Politics of Soci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Boulder : Westview Press, 1987)。

③ Jerzy J. Wiatr, ed., The State of Sociology in Eastern Europe Today(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1)。